

粟米一海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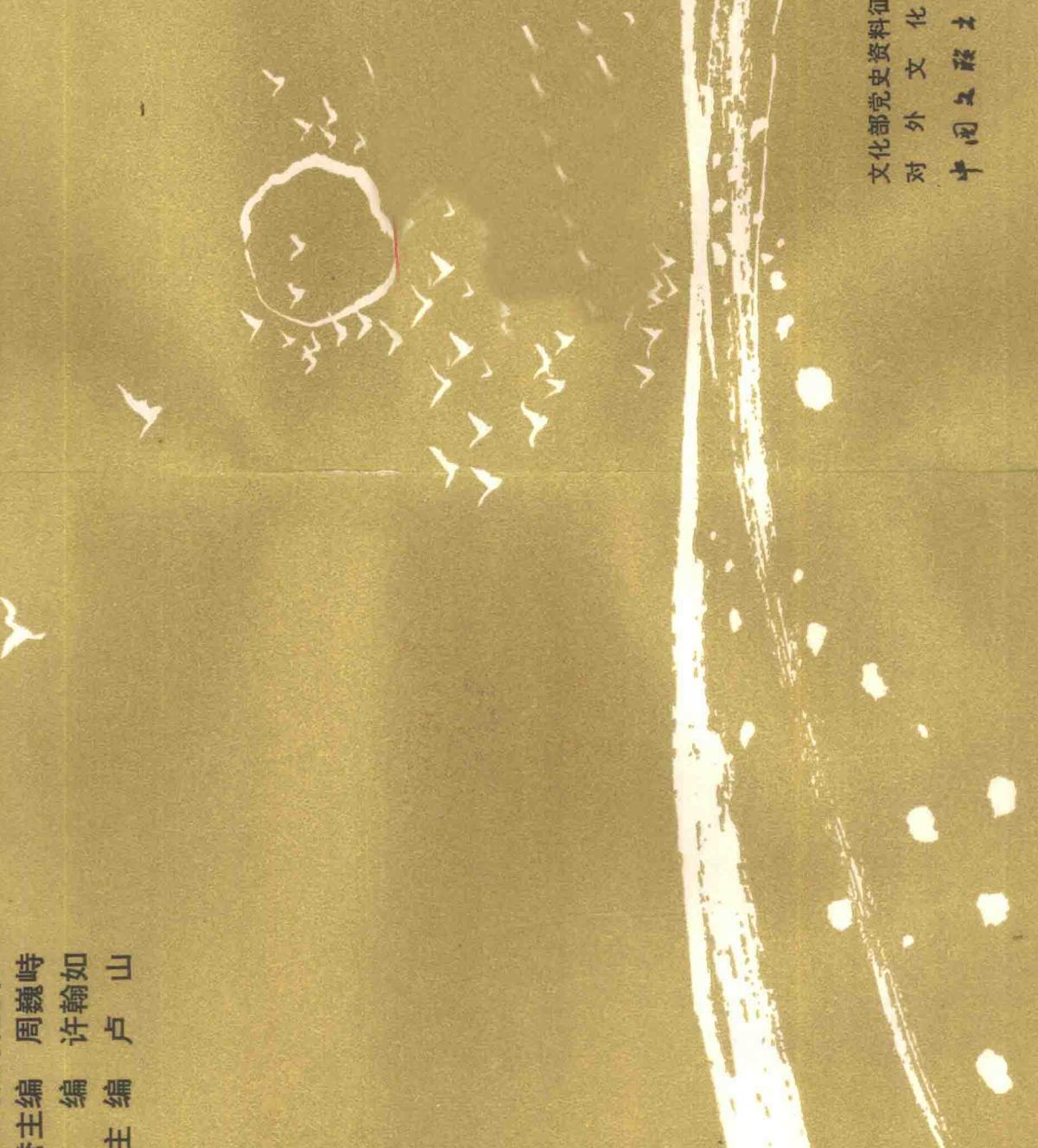
陈辛仁



中國文聯出版社

沧海一粟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编
对外文化联络局
中国文献出版社



● 新文化史料丛书
名誉主编 周巍峙
主编 许翰如
编 主编 卢山
副主编

(京)新登字172号

沧海一粟

陈辛仁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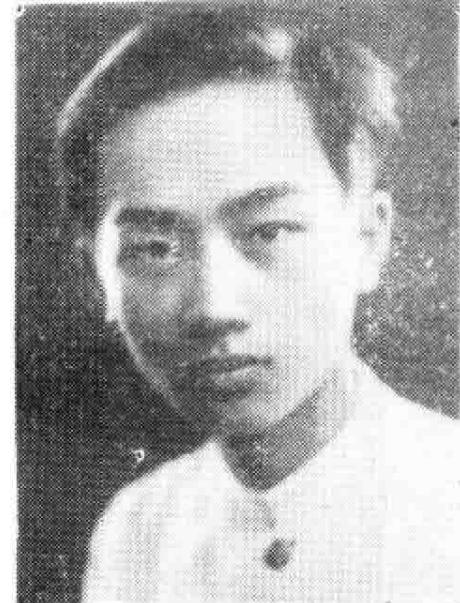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4插页 276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5059-1572-X/I·1068 定价：6.20元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在北平左联时期（一九三三年）。



创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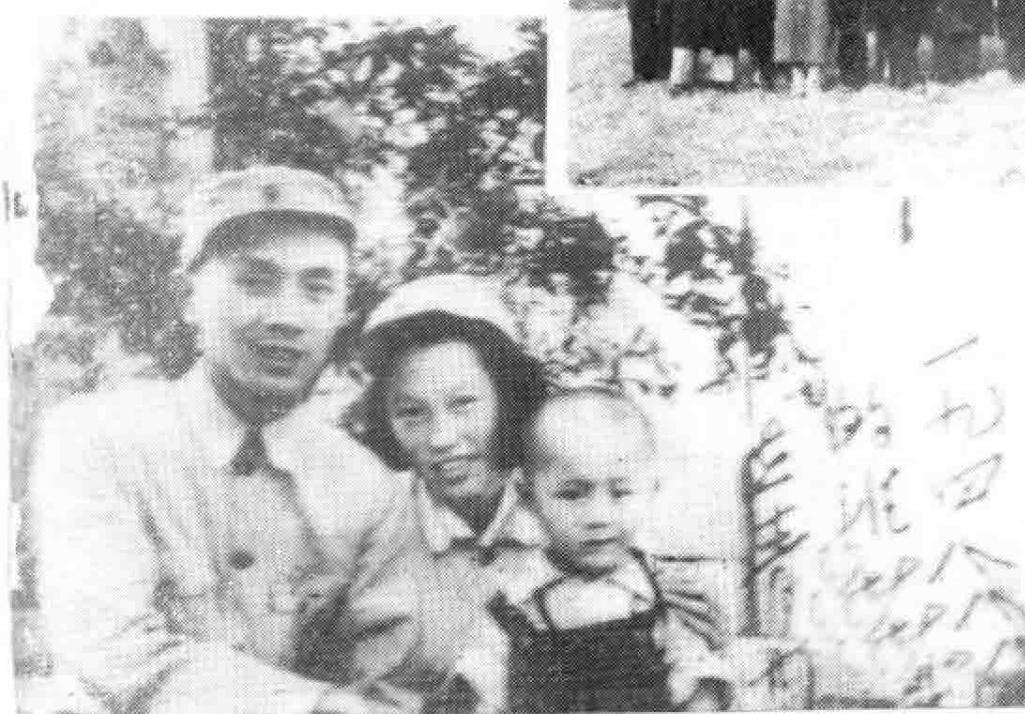
六月份

本 號 目 次

小 說	
罪惡 (P. 1.)	施 川
靈異 (P. 20.)	施 川
論 文	
高爾基與拉美支那文藝大動盪 (P. 25.)	林 蒂
文藝運動上的二三問題 (P. 30.)	左 人
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 (P. 45.)	王 列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P. 49.)	周 勝
詩 歌	
我們沒有春天 (P. 27.)	陳 北 鴻
謝謝你的微笑 (P. 38.)	江 無
童年之一 (P. 40.)	施 川

圖書角 创作 畫畫

作者主编的北平左联机关刊物《理论与创作》的封面（1934年）。



作者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时，与爱人晓植及孩子留影（194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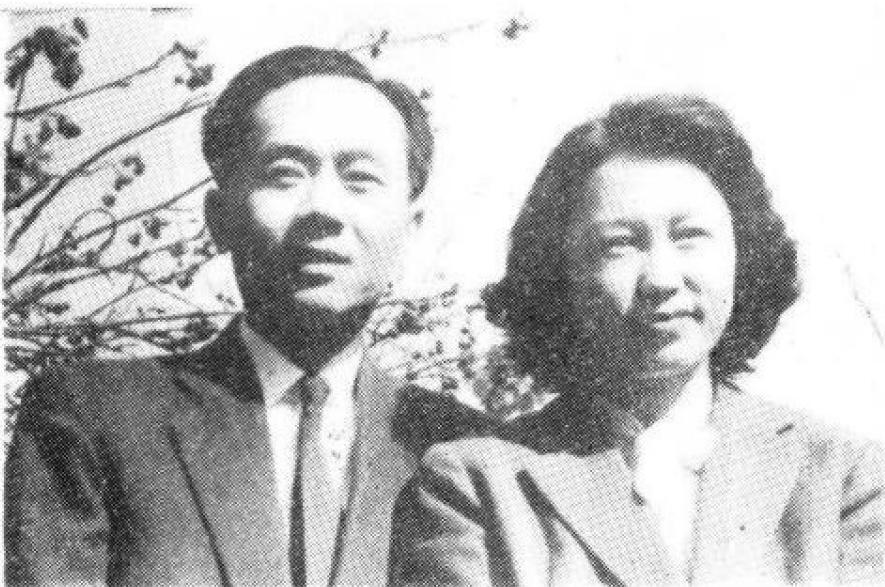
上 作者1938年在新四军。
左上 作者（后排右一）与
新四军第二师领导合影
(1941年)。前排左起：
张云逸、邓子恢、张凯、
梁国斌、张劲夫；后排：
龙潜(左一)、朱达章(左
四)。

左 作者与淮南边区文委
会部分同事合影 (1941
年)。前排右起：蒲澄、作
者；后排左起：俞仲武、
朱达章、朱凡、林冬白。



作者在解放战争时
期出席胶东军区地方会
议(1947年)。右起：作
者、胶东军区政委金明、
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
丞、华东军区政治部组
织部长谢有法、胶东军
区司令员王斌。





作者出任首任中国驻芬兰大使时与夫人晓植留影(1954年)。



作者近影。



作者(左四)任驻芬兰大使时，陪同芬兰总统吉科宁(左一)审查赴中国展出的芬兰油画(1958年)。



作者(右二)陪同外宾与周总理会见英国伊顿大学校长麦克唐纳(右四)。在座还有张奚若(右五)(1971年)。



作者(前右)任对外文委副主任时与澳中基金会签订文化交流计划。



作者(左六)任文化部顾问时出席联邦德国来华音乐小组首演式。(1985年)。

目 录

一 战斗的历程	(1)
二 回忆与怀念	
北平左联恢复活动的一段回忆.....	(56)
记东京左联和杂文社.....	(66)
抗战前夜在南方的《民族战线》杂志和半岛书店	(82)
文化教育为抗战服务.....	(96)
——记抗战开始时从上海到武汉的文化活动	
云岭追思.....	(109)
——皖南军部时期文化宣传活动散记	
鼓角声声.....	(121)
——淮南边区抗战文化简述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区的文化工作.....	(135)
“左联”给我的教育.....	(145)
忆抗战殉国的军事文学作家丘东平.....	(152)
关于作家丘东平殉国情况的调查.....	(164)
凭吊丘东平暨华中鲁艺殉国烈士墓.....	(173)
不屈不挠舍己为公的革命战士.....	(177)
——怀念陈子谷同志	
重温陈毅同志对文化科学与教育问题的论述…	(184)
回忆周恩来总理和几位前辈	

对外学院教学问题的教导	(197)
关于征集对外文化交流史料的意见	(207)

三 文艺理论与批评

文艺理论上的二三问题	(216)
——关于韩侍桁先生的艺术观	
艺术的形式和遗产	(231)
艺术的形式和遗产的一点补充	(234)
为文学遗产答胡风先生	(236)
从创作方法讲起	(238)
典型与现实	(246)
作家论	(250)
批评家的资格	(252)
关于题材的选择与批评的责任	(254)
文学得抓紧科学的手	(258)
艺术自由论	(261)
论当前文学运动的诸问题（节录）	(271)
谈公式化	(291)
为“扫除病根”而斗争！	(300)
关于公式化的二三问题	(304)
蚊丛杂草	(317)
从再建苏联文学的介绍工作说起	(326)
但丁的语言观	(331)
论“知识分子的新生”	(344)
威尔斯往哪里去？	(353)
全民救亡的理论根据	(355)

四 隶写及通讯

更声	(364)
乡途夜话	(366)
西北新区旅行拾谈	(371)
洛阳桥	(383)
弱者的强处	(390)
农村工作杂记之一 ——到民间去之前(一)(二)	(393)
农村工作杂记之二 ——农村宣传队(一)(二)	(397)
采造石膏和矿盐的人们	(401)
京山近事	(405)
后记	(408)

一、战斗的历程

战斗的历程

一

我于1915年11月7日（农历乙卯年十月初一日），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流沙镇华溪乡（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父亲兄弟二人，他是老二，另外还有父亲的两位堂弟（我的堂叔），在一起生活。有几亩水旱田，是两位堂叔和家庭劳动力在耕种，能维持生活。伯父陈清辉和父亲陈清江都受过中等教育，伯父是学交通测量的工程师，父亲考取为赴法国留学生，在我很幼小时即离家出国。我母亲庄婵娟是个家庭妇女，通过自学认识几个字和简单计算法。

我少年时一面在乡村读小学，一面帮做点轻农活，向两位堂叔学习种田的经验，如糊田草，施肥，踏水车等等。我们那地方是个侨乡，据说在国内每个村有多少人，在国外（主要在泰国印度支那）定居的也就有多少人。我的一位堂叔就秘密离家，带着媳妇到南洋去了，以后也不知下落。

我的父亲到法国在里昂住了一年，就病故了。我记忆中，母亲为此悲痛哀恸了好多天，全家人和外乡的亲戚都来安慰她。我那时并不觉得没有父亲的苦恼，总和小孩们闹着

玩各种把戏。母亲自此以后，就决心把我和妹妹抚养成人，她做家庭劳动和女活的负担更重了。

我在小学时读书很用功，因为家里伯父和父亲留有一些《三国演义》、《封神榜》、《罗通扫北》、《石头记》之类的小说，在课余就手不释卷地看起来。有时在亲戚家或伯父家还能看到许多新的读物如《儿童世界》、《少年之友》等，这些读物，打开了我对科学的兴趣。比如，我们乡村靠近南中国海，那里是强台风形成的中心，乡里人把台风卷起海水的白柱，叫做“龙出来了”，接着就是昏天黑地的狂风暴雨，时常涨水，树木、房屋都被破坏，庄稼遭受损失。我就是从课外读物中懂得了龙是不存在的。

我少年时代的历史背景正是1925—1927年大革命从开始到结束的时期，我家乡在广东东江地区，是在广州的国民革命政府两次东征平息军阀陈炯明叛乱的地方。我在小学时，老师教我们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还带我们敲锣打鼓，列队到附近集市上去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等。有一位青年教师，还在课堂上教我们唱“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利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着脚步，要高举我们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那时，东江潮、汕各县在彭湃同志领导的海丰、陆丰农民运动推动下，纷纷组织农会，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农民运动如荼似火。我的村子没有组织农会，但四周乡村农会会员、亲戚，常来告诉农民斗争地主的消息。后来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发动“清党”，成千成万的

共产党员、农会会员被屠杀监禁。各县农军在南昌起义部队配合下，纷纷举行起义，实行土地革命，组织苏维埃政权。我少年时就听到不少附近各乡农军攻打土豪恶霸据点的消息。后来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在我乡附近的流沙镇到汤坑一线被强大的敌军打败了，革命处在低潮，农民运动受到白色恐怖的严重摧残。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渡过的，在我心里种下了对工农革命的同情和对地主豪绅国民党的厌恶与憎恨。

二

我在乡村高等小学毕业后，母亲再也无力供我上中学了，我的伯父是测量工程师，有一点收入，他愿意资助我升学。可是问题来了：升什么中学？本省呢外省呢？

恰巧这时我乡有一位中学生，是在厦门集美水产学校读书的，他回家度假期，对我伯父介绍了厦门集美学校的良好情况，并说服我伯父和母亲，同意让我和这位中学生的弟弟一起，随他到厦门集美学校去投考。他自己在集美水产学校毕业后，还要到日本去进修航海水产课程。

我和他弟弟就随同这位同乡中学生，从汕头乘一夜的海轮，次晨到达厦门，换乘集美学校的小轮船，从鹭江行驶到集美。因为春季招生的只有集美商业学校（当时集美学校分设师范、中学、农林、水产、商业、幼稚师范、小学等学校），我就报考商业学校被录取了，他弟弟后来进了水产学校。这是1928年春天的事。

集美学校是华侨陈嘉庚捐资兴办的。设备、师资各种教

学条件都比较好，学校师生中比较有自由学习研究的空气；但因为国民党在校中控制了训育处（主管政治思想的职位），所以又有政治压制的一面。

这个学校的学生中，当时有一些大革命失败后逃到这里当学生的青年，大都是在东江潮梅地区参加过革命活动的。当时校中也保存着秘密的共产党的党、团组织。我一到商业学校，和一些进步同学（不限于商业学校的）同乡就混熟了，他们有的引导我阅读社会科学，有的引导我阅读文学艺术。我那时如饥似渴地从同学处，从图书馆以及自己购买了许多书籍来读。《三民主义》是教员在课堂上讲的课，讲民族主义时，教员讲得使人很受激动，但是听来听去，内容空洞。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民族社会的现实是黑暗的，悲惨的，国民党统治的中国现状和它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对不上号！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书，读起来很激动青年的心，对黑暗的现实不满、反抗，但并没有具体办法。比较来比较去，我所读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河上肇的《经济学》，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以及《从达尔文到马克思主义》等书，则是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比较符合于我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我从这时起，就开始向共产主义的理想走去。在文艺书刊的阅读上，对反封建的反黑暗现实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文章特别爱好，对“语丝派”、“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也喜欢看。凡是中国新文学前辈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和他们介绍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都贪婪地看个不停。对于商业学校的功课，除中文和外文我还有兴趣外，其他就当了解常识一样应付着而已。

我在集美商业学校入学时是编在第九组（“组”是“年级”的意思），由于平时喜欢看社会科学书和进步文艺书，在本组和外组甚至外校，都结交了一些兴趣相同的朋友，经常在晚饭后在集美学校两旁栽满相思树的林荫道上，或者在潮汐涨落海浪拍岸的海边，一面散步一面漫谈。在1929年初一个晚上，本组的同学陈乃宁（他是广东大埔人）在饭后散步时问我，“你参加不参加CY？”（CY是当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称。）我开始惊异原来陈乃宁就是CY，就在我身边，继而毫不犹豫地欣喜地回答说我十分愿意。就这样，陈乃宁介绍我和第八组的郑国书（福建永春人）在一起，三个人成立一个CY小组。每月有两次或三次碰头会，总是装做饭后在路上或海滨散步的样子，边走边谈，或装做在海滩上向大海丢石块闹着玩；假日就在下午到海边一面捞海白菜，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用种种灰色活动来掩护我们开会、学习和商谈共青团在校内外活动的问题。

当时讨论较多的问题是《共产主义ABC》这本小册子，这是布哈林写的极通俗简明的读物，读了它就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为什么要起来革命，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斗争。有时也交谈一些文艺读物的感想，如对《呐喊》、《彷徨》、《三个叛逆的女性》、《少年飘泊者》等等的体会。另外就是讨论一些国内外时事问题，当时正是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实行反共白色恐怖的时期，政治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分析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本质，以及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打倒国民党的斗争上。

团小组的另一项任务是散发传单，宣传党团的主张和口

号，主要利用各种纪念日，如“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当时写成“刮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剥削残杀劳苦大众，号召群众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改善人民生活。传单是油印的，是从厦门市带过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和同一小组的郑国书一起到厦门去。郑在厦门通过他一位亲戚郑高权的关系，从厦门带回一些传单，我和他分别藏在身上和行李内，乘小轮带回集美，当时集美码头有警察检查巡逻，但我们闯过去了。我们散发用党、团名义印的小传单，只能在夜间散发，因为夜间室内有灯光，但室外是黑暗的，从室内一般看不清室外的动静。我们悄悄地把折好的传单放在一些同学宿舍的玻璃窗外，第二天早晨同学就拾到传单了。有的人悄悄地传阅着，有的人惊叫一声连忙把传单送到训育处去。

团小组的另一项任务是秘密发展团员，这很慎重，要小组同意，并等上面同意后才发展。我经过交朋友和考察，发展了水产航海学校的同乡林邦富（广东揭阳人）等人。林邦富（后改名林英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被党派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中参加斗争，1950年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

我们的团小组利用我被选为第九组学生会主席的条件，用学生会名义做些宣传动员同学的工作。学生会有一间会址，我就和另一位较进步的同学白品三（福建安溪人）二人住在这房间里，室内有阅读书刊报纸台，每天来往的同学不少。我曾发动学生会向训育处提意见，要求改善学生洗澡的条件和改善伙食。有一天夜间郑国书拿了一束当时被禁止的